

新时期争鸣小说纵横谈

CRITICIZING THE FICTINONS CONTEND

黎风 著

◎名著

国民集体无意识的心理学报告

◎格格不入

流行文学与流行情绪

◎东施效颦

深刻毁于权力决定论

◎星王

文化回归与误读老庄

◎心城之恋

与伟大的深刻擦肩而过



四川大学出版社

◎精神病学家的光环——农民意识与形象设计的偏颇

◎周易八卦——故弄玄虚也是一种艺术技巧

◎红墙——在真理的极限上再跨出一步

◎妻妾成群——在江南文学的窠臼中陷落

◎跨虎媚羊的时候——泛人道二重性质

◎雪落黄河静无声——步入误区的狭隘爱国主义

新时期争鸣小说纵横谈

黎风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川)新登字014号

责任编辑:曾绍义(特约) 曾春宁

责任校对:刘树鸿

封面设计:曾 芳

技术设计:礼 平

新时期争鸣小说纵横谈

黎风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望江路29号)

新华书店经销 邛县犀浦印刷厂印刷

850×1168mm 32开本 12.25印张 2插页 300千字

1995年9月第1版 1995年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ISBN7—5614—1233—9/I·174 定价:13.00元

目 录

小序：第三只眼的回眸	(1)
一 “伤痕小说”:遗忘的和不该遗忘的 (7)	
1. 潘保安:《老二黑离婚》为什么	(8)
2. 张洁:刻骨铭心的《爱,是不能忘记的》	(16)
3. 礼平:相逢在《晚霞消失的时候》	(24)
4. 刘心武:人意未遂的《如意》	(32)
5. 张弦:《挣不断的红丝线》缠住了谁	(39)
二 “反思小说”:跨越1966 的地界 (45)	
1. 谌容:《人到中年》万事愁	(46)
2. 王蒙:五彩斑斓的《杂色》	(53)
3. 从维熙:忆当年,《雪落黄河静无声》	(61)
4. 张抗抗:谁是自己的《隐形伴侣》	(68)
三 “改革小说”:在理想与现实间的生长 (76)	
1. 蒋子龙:深入民心的《乔厂长上任记》	(77)
2. 水运宪:《祸起萧墙》谁之罪	(85)
3. 周克芹:为什么《山月不知心里事》	(93)
4. 王润滋:《鲁班的子孙》走过的道路	(101)
5. 张炜:负载着痛苦和希望的《古船》	(108)
四 “寻根小说”:归朴与返真 (118)	
1. 路遥:《人生》的路该怎样走	(119)
2. 阿城:半醉半醒的《棋王》	(126)

3. 韩少功:话中有话的《爸爸爸》	(134)
4. 张承志:收获了什么的《金牧场》	(143)
五 “准性小说”:禁区与误区的重合	(152)
1. 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吗	(153)
2. 王安忆:不堪回首的《小城之恋》	(161)
3. 魏世祥:《火船》烧尽了罪孽吗	(167)
4. 魏雅华:关不住的《美神之囚》	(174)
5. 贾平凹:是冲出还是留在《废都》	(180)
六 “新军旅小说”:超越英雄主义	(187)
1. 徐怀中:来自前方的《西线轶事》	(188)
2. 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献给谁	(196)
3. 刘亚洲:谁造成了《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	(204)
4. 朱苏进:摇摇欲坠的《金色叶片》	(213)
七 /“民俗文化小说”:化古朽为神奇	(221)
1. 汪曾祺:爱情何须《受戒》	(222)
2. 陆文夫:《美食家》吃出了什么味	(231)
3. 冯苓植:《虬龙爪》下,谁主沉浮	(240)
4. 冯骥才:《阴阳八卦》谁人解	(247)
八 “前先锋派小说”:一种新理性的诞生	(255)
1. 刘索拉:困惑中《你别无选择》	(256)
2. 徐星:不和谐的《无主题变奏》	(264)
3. 陈村:虚空中,有《少男少女,一共七个》	(272)
4. 莫言:令人恐怖的《红蝗》	(280)
九 “新小说派”:形式主义美学的崛起	(288)
1. 马原:《战争故事》该怎么讲	(289)
2. 洪峰:永远也望不穿的《瀚海》	(298)
3. 余华:《河边的错误》无法原谅	(305)

4.	苏童:是非之间,《妻妾成群》	(312)
十	“新写实小说”:冷眼睛和热风景	(319)
1.	刘恒:《白涡》的吸旋力究竟多大	(320)
2.	刘震云:捡不起来的《一地鸡毛》	(327)
3.	方方:这里的《风景》并不美丽	(334)
4.	池莉:令人不再生气的《烦恼人生》	(341)
5.	叶兆言:《艳歌》一曲为谁唱	(348)
十一	“都市灰色小说”:失乐园的精神放逐	(355)
1.	王朔:《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水火能容吗	(356)
2.	陈建功:《鬈毛》活着图个啥	(363)
3.	黄蓓佳:并不温馨的《玫瑰房间》	(370)
4.	张欣:《格格不入》,原因何在	(377)
	后记	(385)

第三只眼的回眸

——小序

十年前我师从著名文学批评理论家唐正序教授做研究生时，专业的研究方向是文艺批评，可中途我的兴趣转移到了西方文论及艺术心理学方面，钻进了旁门左道。多年来，在顽固地执迷于自己兴趣并瞎折腾的时候，我心里又老有一种对先生的歉疚感，很想在文艺批评这个本行当上做点事，作为对唐师辛勤教诲的回报。按理说文艺批评是个天地宽阔的研究领域，乍一看是处处文眼，皆可理论，但真要落笔，才发现极容易复归于故辙老路，这是我不愿意的，研究主题几经游离后，还是搁置下来了。

91年左右，我很偶然地为本科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中国当代争鸣小说”的选修课，没想到大受学生们的欢迎，在此中可以评介作品，点化理论，指点争鸣，社会人生、文坛热点、文学现象也可糅入其中，有相当大的自由发挥的余地，我讲得起劲，学生也听得过瘾，每次开这门课都有不少外系学生和校外的文学爱好者来听课。几年下来，这门课无意间竟成了我的“保留节目”。但限于课时，涉猎的作家作品自然有限，经常弄得台上台下都有余兴未尽之感。于是，我猛然想到：既然这么多人对争鸣小说感兴趣，何不以此为题，也好了一却自己的一个心病和愧憾。

我以为：小说家看社会是一只眼，批评家看小说又是另一眼，而现在需要的是第三只眼——这就是对争鸣小说（创作）和小说争

鸣(批评)的交互式扫描和再批评。这样一来,原来经常分离的小说创作、小说评论、小说理论和小说史就可以构成一个彼此相系、各有属重的有机的整体,点面亦可兼顾,这也算是一种对关涉新时期小说创作的文学实践活动进行“纵横”批评的新视野,可以一箭双雕或射穿数靶。

就我个人的理解,“争鸣小说”是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新概念和新说法,它特指一部分在社会中反响较大的、引起评论界普遍关注和评价分歧较大的小说。“争鸣小说”虽然不尽然都是作家最优秀、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但我认为它们是小说中最富生气、最具价值的部分,这些作品不是标新立异,就是首闯禁区、刺激敏感,往往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文学形象式的探险和冲击,从而引起人们在文学淡季和旺季都对这种精神活动的持久重视和频频回首,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到文学实践中来,使文学实践成为一种波及面甚广的社会群体行为和活动。这当然是文学价值的最高体现,也是作家个体创造的社会化实现的最高极致了。

一部小说能引起争鸣,这对作家而言是一种农夫收获般的幸运和幸福,也是一种特有的社会关怀。记得有位青年作家曾说:作品发表后,心里就在盼望人家评说,不怕挨骂,就怕人家不置一词,评论界鸦雀无声,面对冷淡和漠视形同受罪。这是实话和一个普遍的心理现实,做人怕孤独,为文也怕寂寞。即便是天性狂狷的卡夫卡,写作一惯是我行我素,但心里仍然在渴盼着“人家的关怀”,恐怕许多大师在这点上都难以脱俗。天津作家林希90年发表了《柏士无非子》,文坛一派肃然,没有半点反应,以致于后来他在一篇创作谈里提及此事时还流露出失望,语气也有点酸溜溜的。

当然,“争鸣小说”又是一个相当含混的说法,甚至可以把绝大部分的新时期小说囊括进去。照此来看几乎每个作家都曾体验过这种任人“关怀”、或褒或贬的“幸福”,不少作家都是在激烈的争鸣中脱颖而出,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其创作广泛而持久的关注,这是作

家成长成熟的一个特殊的途径，象张贤亮、贾平凹、王朔、苏童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甚至认为，任何一部作品都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相同的评价，都会引起争鸣，一部文学史（小说史）从另一角度看，又一部是批评争鸣的历史，争鸣既出作家作品，也出批评家和形成批评理论。

从“争鸣小说”这一特殊的角度进行文学批评研究，使我受益匪浅，对原本以为比较熟悉的中国当代文学有了一种更深入更系统的新观照。我觉得，在整个新时期文学中，小说所取得的成就无疑是最大的，发展水平也是最为稳定的，就象丰厚而扎实的“黄土地”，可以时时翻新，经年耕耘，我把自己力求不法前识的解读融入其中去了。

但总体上看，在上溯十余年的回眸中，我感到新时期小说的发展始终处在巨大而尖锐的矛盾冲突之中：一方面力图摆脱以往传统“政治文学”的窠臼，但另一方面又因某种强烈的政治情结不自觉地悄悄逼近政治，具有越来越鲜明的社会批判的“文学政治”色彩；一方面是拆除禁区的“性突破”，但另一方面又陷入只承认性的自然属性、性审丑而不敢性审美的“性迷失”；一方面主张题材和创作领域的“多元化”，但另一方面又在过份表现自我、玩味琐屑丑陋中表现出创作的雷同和“单一化”；一方面强调文学的“平民意识”，消解英雄主义，但另一方面又在艺术表现上显得很“贵族化”；一方面力主民族性和个性化的“创造”，但另一方面又过份倚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摹仿”，创新中包含着重复；一方面在文学滑坡中坚持“反商业”的精神价值旗号，但另一方面小说在出笼包装、文稿拍卖和影视化上已经采用商业化的运作方式，文学的精英意识和个体话语已为大众情绪操纵而日益消解；一方面“严肃小说”力图与“通俗小说”划清界限，保持距离，但另一方面近年来的“长篇小说热”又不得不接受日益“通俗化”的现实，形成了非文学自身生成规律外的“外热”而不是“内热”，是一种勉为其难和虚张声势造成的“虚

热”……等等，不一而足。

这一切既是新时期小说与“十七年”小说的根本区别，也是新时期小说自身发展过程中的优长缺陷和特点，这是在我的第三只眼里映现出的一道暗淡中不乏辉煌、混沌中不乏透明、失望中不乏希望的真实的风景线。

毫无疑问，新时期小说的长足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辅佐和促进。司汤达认为文学与社会和政治是“磨心和磨盘”的关系，犬齿咬合，相辅相成，我以为创作与批评也是这种关系。但更进一层看，我把个体感悟体会式的评论看成手指的指指戳戳，而把群体反应、焦点聚集的文学争鸣看成拳头的猛然出击，它对文学创作和社会现实的反作用力是强悍而有效的，它不仅表现出批评的一种集体存在，而且也充分显示了批评的主体性和再生价值。一般而言，文学争鸣有三大功用：一是专业化地评介作品，有助于作品的深入理解；二是吸引更多的人卷入文学实践活动，最大程度地实现文学的社会化作用；三是引导作家今后的创作，辅助作家成材和健康地发展。文学争鸣正因为是在同一对象上见仁见智，观点看法千差万别，相互抵牾碰撞，这才最容易迸发出思想的火花和智慧的光芒，这也往往是一个批评家的批评思想和批评实践中最为精彩、最有价值、最富创见的部分。我在这次对新时期小说批评争鸣的系统整理中发现，原来有些批评家在一般性的文学评论中老腔老调，毫无新意和生气，可一上争鸣战场，就判若两人，论说锋芒毕露，妙语连珠，令人拍案叫绝，刮目相看。显然，这种具有冲击性、对抗性的文学批评活动激活了他们理论思维和神经，提高了他们的批评质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争鸣促进了一般性文学批评的整体性成熟和高水平发展。

当我用第三只眼的目光在这些最富生气的热点小说和最富于挑战性的争鸣文章上作来回游移并试图“再批评”的时候，经常不由自主地被卷入一种强烈得不能遏制的倾吐状态之中，交锋的刺

激和创见的困难反倒使我兴奋不已。

纵观来看，新时期小说争鸣已经形成了三大“争鸣主题”，只要小说创作涉及这些方面并有所创新，最容易在批评界掀起波澜，评说纷起：一是“人性主题”（或人道主义），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老主题、老火药桶，一触即燃即爆，象围绕《如意》、《晚霞消失的时候》、《女俘》、《古船》、《战争故事》等小说的争鸣皆是如此；二是“道德主题”（包括爱情问题），这是礼教深厚的中国在新时期社会生活中最大最普遍的变化，对《爱，是不能忘记的》、《人生》、《鲁班的子孙》、《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等小说的争鸣由此而起；三是“性爱主题”，从85年开始小说写“性”成风，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到《废都》，关于性本能、性体验、性描写等方面的小说争鸣一直不断。这三大主题在具体某部小说中和具体的争鸣中又往往是相互交叉、若即若离的，但最终归其一点：“人”的问题。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新时期创作思潮和审美风尚的革命性嬗变，文学创作和批评从更深层次和更新的角度复归了自身的本质。

但是，正是因为立足于这种表现人、认识人和创造人这一宏大的主题，从高标准来审视和考察新时期小说争鸣我又深感这些拳头有时攥得不够紧，击出也欠足功力，主要体现为以下不足：一是争鸣缺乏针对性，焦点散漫，经常形不成对话交锋的契机，没有构成真正的争鸣机制，从而也影响了讨论的深入；二是争鸣文章欠缺对作品的细致把握，稍有所感就立马挑战，于作品的具体实际有较大差距，甚至有时粗心得编出了批评性的附加情节；三是争鸣文章缺乏哲学基础和理论深度，直觉式的印象批评仅仅表明或褒或贬的主观态度，令人觉得精彩有余，深刻和严谨不足；四是争鸣往往局限于小说思想内容的讨论，关涉艺术表现和技巧性的争鸣极少，往往是在技巧运用上点评一下，虚晃一枪又直奔主题去了，这对艺术表现传统向来淡薄的中国当代小说发展有误导的倾向。上述的争鸣批评的不足，由于长期以来很少人关注和进行清理总结而貁

穿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始终。争鸣往往是自生自灭，不了了之，对这一重要的文学现象的漠视当然是一大遗憾。

有位朋友曾经开玩笑说我对争鸣小说和小说争鸣的“纵横”再批评很有点裁判的味道。这很使我惶恐和不安，这样的裁判我既无资格也无能力担当，这仅仅是我参加的略嫌滞后的文学争鸣，也算是我这个文艺批评专业出身的人企图改邪归正的一次初步尝试。我相信，于争鸣小说和小说争鸣而言，任何人的再批评都不是终极裁判，依然只能是见仁见智，各抒己见，这是一种心灵飞腾的自由和精神驰骋的快慰。真正的裁判，只能是历史，唯有它才能证明所有发生和存在的价值。

“伤痕小说”：遗忘的和不该遗忘的

终于，一种畸形的政治狂躁和暴虐在惯于沉静的东方古国横行，人性的沦丧和个性的柔弱在矛盾的状态下演出了一幕幕苦难的悲剧，这使人想起了罗伯斯庇尔的血腥专政。但东方式的细腻将一切吞噬肉体和灵魂的恶毒不动声色地植入家庭和生活，显出了亲切和温柔，你只有不满或不适的感觉，甚至分不清黑暗与光明、红色与白色，最可怕的是你不能反抗，它有一个神圣的名字——革命。于是，“以革命的名义”，青春被流放，爱情被奸污，家庭被拆散，人性被撕裂……面对史学记载的缺席和怯弱，文学挺身而出，这显然只是历史的部分真实。也许永远就没有什么真实，它藏在破碎的心灵和血污溢流的伤口之中，只投下一个伤感的阴影在文学中，很浅，也很深。

1993年12月17日

1

潘保安：《老二黑离婚》为什么

当我还小的时候，就从大人们口里听到了许多有关赵树理同志的传说。十一岁那年，我第一次接触小说，看的就是《小二黑结婚》。也就在那个时候，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早早地刻下了赵树理同志的名字。

潘保安《我怎么想起写〈老二黑离婚〉》

1945年10月《新文化》创刊号发表了一篇轰动解放区的小说，它就是赵树理写于1943年的《小二黑结婚》，故事的生动有趣，立意的现实针对性，语言的诙谐活泼以及小说独具的地方民族风格和乡土气息为广大读者喜爱。彭德怀在小说刚发表时就为之题词：“像这样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这部小说长期以来被视为解放区小说创作的经典代表之作，对“山药蛋派”的形成以及民族乡土通俗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几十年过去了，就在赵树理1970年被迫害含冤致死的第九个年头，《汾水》1979年第10期发表了潘保安的短篇小说《老二黑离婚》，《小二黑结婚》终于有了一个新的续篇。但它已没有原著的那

样轻快活泼，而是一个令人心酸苦涩的故事，作者“谨以此悼祭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赵树理同志”，当然是笑不出声，轻松不起来的。

年轻时二黑破除封建陋习，自由恋爱，久经磨难与小芹结婚，可到老来反倒闹离婚，这就大大吊起了人们对以前影响很大的作品会有个什么结局，有个啥样续篇的胃口。

二黑与小芹结婚后，生了一儿一女，双双加入了共产党，生活美满幸福。“大跃进”时当公社书记的二黑因为“说实话”，不乱放卫星，被打成“右派反党分子”，弄得全家不得安宁：“文革”中又因二黑的“历史问题”，害得儿女们的亲事屡屡不顺不幸，女儿梅梅上吊自杀差点身亡，万般无奈老二黑只得与恩爱患难几十年的小芹离婚……

这是一部完全摹仿、师承赵树理艺术创作手法的小说，作者是位名不见经传的汾水县青年人，这部作品既反映了他对赵树理的景仰之情，也显示了他在取材上机智聪明，评论界对这部非常粗浅的小说给予关注，不难看出其中还含有对乡土文学大师的缅怀之情。潘保安为二黑安排的命运和结局自然也会引起评论者的关注，各种不同的意见接踵而来。总体来看，争鸣是围绕着小说的“真实性”展开的。

《老二黑离婚》的情节安排直接与《小二黑结婚》相连对口，时间从1943年5月到文革刚结束，但重点情节安排于1958年的大跃进和文革时期，老二黑在两个时期开始了他和家庭的悲剧。作品的意图非常简单，通过一个家喻户晓的“典型”文学形象从结婚到离婚，从生气勃勃的“小二黑”到木讷痛苦的“老二黑”，揭露极“左”的政治路线在不同历史时期给国家给老百姓造成的灾难。一个在民主革命时期，以“结婚”和自由恋爱为中心内容，并对破除封建思想和买卖婚姻的中国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二黑，竟然离婚了！其结婚和离婚都具有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绝不单单是个人行为。那

么，导致老二黑离婚的因素再也不是封建礼教，而这个悲剧性的结局恰好是二黑为之奋斗的革命成果给他带来的意想不到的灾难，他也是妨碍儿女自由恋爱、结婚的障碍，这样的故事是否符合其命运发展的必然和历史生活的真实性呢？

弃石直言不讳地指出，《老二黑离婚》缺乏《小二黑结婚》那种内在的感人至深的艺术感染力，其主要原因就在它“不够真实”、“失真”，理由大致有两条：一是小说情节“违背历史真实”和本来面目，“反右倾”斗争是在59年庐山会议后展开的，而农村并未在公社一级进行“广泛地采取组织措施”（意为撤职，划为“敌我矛盾”），况且中央后来又专门在农村工作中“纠左”，但小说将老二黑被打成“右倾反党分子”撤职查办写在58年春并直至文革都没有得到昭雪是歪曲了历史。二是小说缺乏“为生活的真实所规定的情节发展的内在逻辑”，原著中的二黑和小芹个性鲜明，敢于为个人幸福斗争，而到了《老二黑离婚》中他们却忍辱负重，甘心离婚，“当年的斗争性格似乎完全被淹没了”。^①

对弃石关于小说“不真实”的批评，许多评论者不以为然，认为这种分析是站不住脚的。恰恰相反，这篇小说的最大优点就在于“真实”，就在于它真实地反映了长期以来极“左”路线给农村生活带来的深重灾难，真实地描绘了一个好不容易摆脱了封建枷锁获得幸福自由的农村青年在新的封建余毒下所经历的悲剧性命运。戈佳在《艺术真实不是照搬生活》一文中认为弃石的批评的错误结论就在“苛求作品所塑造的艺术典型化了的人与事都能与实际生活中的具体的人与事对上号”，他主张文学创作不一定非得拘泥历史中的每事每人的所谓“真实”，而应该根据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律来塑造形象和反映现实。与之看法大致相同；吴佩光、王之元的《可喜的进步·漫长的道路》评论也认为弃石的批评有失偏颇，并立足于

^① 弃石：《〈老二黑离婚〉不够真实》，《山西日报》1979年11月4日。

作品本身反驳了弃石认为老二黑和小芹“屈服”、“妥协”的看法，指出老二黑在新形势下和自身处境困难的情况下，其斗争性格并未消弭，只是以“说实话”和“按实际来”来同邪恶势力和极左路线作斗争，“今日的老二黑正是当年的小二黑！而且由于长期的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的陶冶，老二黑较之小二黑更老练，更沉着，更求实，更富斗争的策略性”。①

仔细地阅读作品和查阅有关“反右倾”的政策和历史资料，不难看出弃石的批评是有所根据的，小说在情节安排是有漏洞和授人以柄的。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潘保安是个出道不久的年轻作者，他对所涉及的历史背景缺乏深入细致的了解（据其创作谈称“我开始懂事了，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难免在创作中有些顾此失彼和考虑不周，不独青年作者，在中外文学史上即便象大仲马、塞万提斯等人作品也有前后矛盾的情况，或将历史年代弄错，或小说前面死掉的人物不注意又活过来了，当然对一个青年作者就不应太苛求。

但是，作为叙事艺术的小说而言，创作时应尽可能注意情节与历史真实的吻合，因为小说的艺术真实性包含有如实反映历史的现实的基本内容，对于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而言尤其要注意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些人所共知、影响很大的背景性材料绝不能凭空想象，任意改动，否则会贻笑大方，弄巧成拙。在雨果的《九三年》、《悲惨世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梅里美的《嘉尔曼》以及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子夜》等小说中，我们不难看到他们对自己小说所关涉的历史事件等背景性材料的熟悉和研究透视力，这表明文学创作不仅需要作者的才气、艺术感受力和表现力，而且还应具备相当的学识，这恰好是不少青年作者忽略了的问题。

① 戈佳和吴佩光、王之元的文章参见《山西日报》1979年11月3日。